

蘇門詞人

群体概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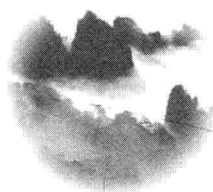
陈中林 徐胜利 / 著



陈中林 徐胜利、著

蘇門詞人

群体概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门词人群体概论/陈中林,徐胜利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5

ISBN 978-7-216-08236-5

I. 苏… II. ①陈…②徐… III. 宋词—诗词研究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0508号

出品人:袁定坤

责任部门:文史古籍分社

责任编辑:余兆伟

封面设计:何 鹰

责任校对:范承勇

责任印制:谢 清

法律顾问:王在刚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302千字

版次:2014年5月第1版

书号:ISBN 978-7-216-08236-5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

邮编:430070

印张:18.5

插页:3

印次: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导 言 / 1

第一章 文化背景 / 6

第一节 元祐更化 / 7

- 一、元祐更化的起源 / 7
- 二、反对王学与力辟柳词 / 9
- 三、振拔士节与提高词格 / 13

第二节 元祐党争 / 16

- 一、人事的变迁:个人升沉与词学中心 / 17
- 二、党争的无奈:浮生之嗟和贬谪之叹 / 20
- 三、精神的港湾:家园之乐和渔父家风 / 23
- 四、矛盾的心态:诗祸影响与言志功能 / 26

第三节 元祐学术 / 29

- 一、苏门词人群体的学术成就 / 29
- 二、元祐学术精神与苏门词人群体风貌 / 31
- 三、元祐学术对苏门词人创作的双面影响 / 35

第二章 结群因缘 / 39

第一节 结群因缘 / 39

第二节 群体形成 / 44

- 一、苏门词人群体的形成 / 44

二、苏门词人群体形成的决定因素 / 48

三、苏门词人群体的主要成员 / 52

第三节 群体特征 / 57

一、苏门词人群体特征的考察角度 / 57

二、苏门词人群体的主要特征 / 58

第三章 词学生活 / 69

第一节 词坛概况 / 69

一、北宋前期 / 70

二、北宋后期 / 74

第二节 词人雅集 / 82

一、西园雅集 / 82

二、前后六客词会 / 86

三、《坡门酬唱集》 / 87

第三节 词学批评 / 90

一、苏门词人群体词学批评的基本情况 / 90

二、苏门词人群体词学批评的显著特点 / 92

三、苏门词人群体词学批评的文化启示 / 95

第四章 词学观念 / 97

第一节 词体观念的确立 / 97

一、诗裔说 / 98

二、诗余说 / 101

第二节 词学功能的认同 / 104

一、歌唱娱宾 / 104

二、遣兴自娱 / 107

三、寄意抒情 / 109

第三节 词人意识的强化 / 111

第五章 词学理论 / 115

第一节 词学本体论 / 115

- 第二节 作家创作论 / 122
 - 一、黄庭坚的作家论 / 122
 - 二、张耒的创作论 / 127
- 第三节 词体风格论 / 128
- 第四节 审美理想论 / 131
 - 一、“韵”的理论内涵 / 132
 - 二、“韵”的人文精神 / 134
 - 三、“韵”的美学意义 / 137

第六章 词学创新 / 144

- 第一节 词学背景 / 144
 - 一、“以诗为词”的词学背景 / 145
 - 二、“以诗为词”的共同倾向 / 147
- 第二节 内涵特点 / 150
 - 一、“以诗为词”的词学内涵 / 151
 - 二、“以诗为词”的审美追求 / 153
 - 三、“以诗为词”的本质特点 / 157
- 第三节 词史意义 / 160
 - 一、“以诗为词”的诗学基础 / 160
 - 二、“以诗为词”的必然趋势 / 162

第七章 主题开拓 / 167

- 第一节 男女情爱的净化 / 167
 - 一、题材分布 / 168
 - 二、形象类型 / 170
 - 三、词史意义 / 171
- 第二节 日常生活的诗化 / 173
 - 一、题材内容 / 174
 - 二、美学内涵 / 176
 - 三、文化意蕴 / 177
- 第三节 幽隐心灵的物化 / 182

一、创作概况 / 182

二、审美特征 / 184

第四节 士人情怀的俗化 / 189

一、天上人间的相思:七夕词 / 189

二、白发黄花的风流:重阳词 / 195

第八章 形式探索 / 200

第一节 拓展词体内涵 / 200

一、提高词品 / 201

二、扩大词境 / 202

三、推进词律 / 206

第二节 借鉴诗歌作法 / 208

一、回文 / 208

二、集句 / 212

三、隐括 / 216

四、其他 / 219

第三节 应用曲艺体式 / 221

一、《调笑》转踏词 / 221

二、《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 232

第九章 艺术个性 / 239

第一节 群体风格 / 239

一、苏门词人群体风格的主要类型 / 239

二、苏门词人群体风格的多元特色 / 246

第二节 东坡家法 / 247

一、从正面表现活动主体 / 248

二、以数字构筑艺术世界 / 249

三、善于选用风、云、月等自然物象 / 250

四、炼铸富有个性化特征的动作动词 / 252

第三节 淮海词心 / 254

一、假设以现情 / 256

二、反跌以见情 / 257

三、设问以抒情 / 257

四、加倍以表情 / 259

第四节 山谷本色 / 261

一、以健笔写柔情 / 262

二、寄豪放于婉约 / 263

三、于丽情中议论 / 264

四、用对立性意象 / 265

第五节 归来情结 / 266

一、咏叹“归来” / 267

二、行吟“东皋” / 269

第十章 词史影响 / 273

第一节 东坡词与豪放派 / 273

一、苏轼词对后世的影响 / 274

二、苏轼词影响的深层原因 / 276

第二节 淮海词与婉约派 / 277

一、写景铺陈,融情于景 / 277

二、化用成句,使事用典 / 278

三、音韵谐美,格律精严 / 280

第三节 山谷词与骚雅派 / 281

一、倔强之气 / 281

二、生硬之格 / 283

三、旷逸之怀 / 285

结束语 / 287

参考文献 / 289

导 言

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抒情诗,自从产生以后,经过晚唐五代以温庭筠为代表的专业词人的创作实践,逐步建立起了柔媚侧艳的“花间范式”,形成了婉约绮丽的艺术风格。北宋初期,晏殊、欧阳修等词人,只是在沿袭花间传统的前提下进行创作,将词作为花间尊前、歌筵舞席的娱宾遣兴之具,对词体没有任何创变。到北宋中后期,以苏轼为代表的苏门词人,由于不满花间词绮靡俗艳的传统,便高擎“以诗为词”的改革大旗,开始对词体进行积极的革新和创造,使词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阶段。这种革新影响于南宋,终于使词这一文学样式在宋代发展到了艺术的顶峰,以至被后人誉为“一代之文学”。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北宋中后期词坛时,不禁惊异地发现,这一时期词家辈出,名作如林,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片灿烂耀眼的星空:作为核心的,自然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苏轼;围绕着他的,则是被称为“苏门四学士”和“苏门六君子”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和李廌;以此为中心,还有李之仪、赵令畤、贺铸、毛滂、张舜民等人。他们以苏轼为中心,形成了北宋继欧门文人群体之后又一个著名的文人集团,我们称之为“苏门词人群体”。这些苏门词人,在元祐时期聚会京师,团结在苏轼的周围,相互唱和,相互切磋,不仅取得了丰富的创作实绩,而且作出了突出的理论建树,共同促进了北宋中后期词坛的繁荣,从而形成了宋代词坛的独特文学景观。因此,我们研究宋代词学,自然不能不重视苏门词人群体的词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并对其进行深入的考察和探索。

苏门词人所处的时代,是政治变革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政局多变、新旧党争此起彼伏、党派之间相互倾轧的时代。神宗朝,新党执政,推行新法,反对变法的旧党人士大多被排斥出朝廷。哲宗元祐年间,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人士而力斥新党,属于旧党的苏轼及苏门诸君子纷纷回朝,会师于汴京,诗词酬唱,酒酣耳热,文

坛盛况空前。而高太后归天后,在哲宗亲政的绍圣、元符年间,新党卷土重来,并大肆迫害旧党人士。苏轼及其门下士都受到残酷打击,贬谪放逐,无一幸免。徽宗即位之初,还想调和新旧两党的争斗,但一年之后,新党的投机分子蔡京等执政,又大开杀戒,对旧党实施了更为严酷的打击。政局的动荡变化,直接影响了卷入党争漩涡的词人的命运。苏轼及苏门词人的升沉荣辱紧随着政局的动荡而变化。他们比以柳永、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等为代表的第一代词人更普遍、更多地体验到命运的坎坷、人生的失意和仕途的蹭蹬,他们都是文坛(词坛)上有盛名而政坛上无高位的失意文士。因而,这个时期的词作主要表现的是个体生存的忧患和人生失意的苦闷。

十一世纪七十年代初,文坛主将欧阳修去世后,从四川盆地冲出的大才子苏轼在欧阳修生前的大力扶持下继起而执掌文坛。他以文坛领袖特有的胸襟和悍然不顾一切的气魄对词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开拓和变革,“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词是抒情的文学,苏轼无意于改变词抒情的文体特性,而是要拓展词的情感领域,扩大词的抒情功能,将只表现“爱情”的词扩展为表现“性情”的词,将只表现女性化的“柔情”的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的词,使词像诗歌一样可以充分表现创作主体的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性情怀抱。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词,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也说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六《新轩乐府引》)。在抒情取向上,苏轼沿着柳永开启的方向进一步朝着个性化、自我化的轨道开拓深化,使词的抒情取向更贴近创作主体的自我人生,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错位走向同一对应。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其词里那位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筵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苏轼很善于对人生进行思考。他曾经在词中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

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谓“人生如梦”,既是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一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当表现社会生活的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境界,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自晚唐五代的《花间集》至柳永的《乐章集》,词以言男女私情为主,又不乏淫靡冶荡之音,以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来衡量,词的品位自然比不上言志载道的正统诗文,因而在当时文人士大夫的观念中,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技”,是一种“谑浪游戏”的文学。虽然作词者甚多,读(听)词者甚广,但人们是既爱之又贱之卑之。如曾作过宰相的韩维,他本人写过不少词,可当他见到晏几道送给他的一卷词时,却说小晏是“才有余而德不足”。在韩维的观念中,作词几乎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因此他劝诫小晏不要作词,以保全德行:“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九)对词的鄙视,认为词卑、词小,是北宋中叶以前比较普遍的观念。

苏轼以其众多的典范之作表明:词不仅可以言男女私情、爱情和柔情,也可以像诗一样充分表达人的各种性情、情怀和情趣。词具有与诗歌同等的抒情功能,关键在于创作主体如何把握和运用。如果说此前词作内容比较狭窄,情调或有不高,那也不是词体本身的先天不足、形式局限,而是作者思维的惯性、定势使然。苏轼之后,诗尊词卑的观念逐渐得到扭转、改变,词体的文学地位逐步得到认同。词由音乐的附属品、文人游戏的“小道”、“末技”渐渐变成了一种具有独立品性的与诗并驾齐驱的文学体裁。这表现在:

第一,词话专书相继出现。神宗元丰年间,杨绘写出了宋代第一部词话著作《本事曲》。此后,苏轼门人晁补之也写过一本“论乐府歌”的词话著作《骈觥说》。至南宋初年又有杨湜的《古今词话》和王灼的《碧鸡漫志》等相继问世。而成书于北宋宣和五年的阮阅所著的《诗话总龟》(原名《诗总》),分四十六门辑录诸家诗话,其中专列“乐府”一门采录词话。其后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也专设“乐府”一类。词话专著的出现,表明词之为体已在理论观念上得到确认,故理论家觉得有必要写(编)书

来讨论词的有关问题。诗论家们让词作为独立的一“门”进入诗话著作,也反映出词体的独立地位获得认同而在诗学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词的读本陆续问世。在五代宋初,词选集《花间集》、《尊前集》、《家宴集》、《金奁集》以及词别集柳永的《乐章集》、张先的《张子野词》等,都是作为唱本来传播,即主要是供歌妓乐工演唱用的“脚本”。其中《尊前集》、《金奁集》和柳、张的词集都是按宫调编排,以备选唱,作为唱本的功用更明显。至北宋末南宋初,词选集如黄大舆的《梅苑》(录唐五代北宋间的咏梅词)、曾慥的《乐府雅词》和鲖阳居士的《复雅歌词》等,则是作为文学读本来传播。编选者的目的主要不是供人作演唱之用,而是供人在案头阅读欣赏。词集由唱本向读本的转变,反映出宋人词体观念的变化,即词由从属于音乐的“歌曲”已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此即四库馆臣所说的“音律之事,变为吟咏之事,词遂为文章之一种”(《四库全书总目》卷二〇〇《宋名家词提要》)。有些词集命名为“雅词”,其用意即在于抬高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花间”、“尊前”一类的“艳科”、“小道”中昂首阔步进入文学之林。黄大舆在《梅苑》序中说咏梅词的作者与“诗人之义托物起兴,屈原制《骚》盛列芳草”是“同一揆”,把咏梅词与《诗经》、屈原《离骚》的比兴传统联系起来,推尊词体之意也极为明显。

第三,词作进入庙堂,得到皇家帝王的认可。北宋初中叶的帝王,如仁宗等君主,感情上喜爱词作,而理念上却是排斥鄙弃。他们只在后宫便殿里私下让歌妓乐工唱词,而很少在朝廷庙堂公开场合演唱词作。他们与臣下经常唱和,但只唱和诗作;他们经常作诗赐给群臣,但从未写词送给臣下。到了徽宗朝,形势大变。徽宗不仅亲自上阵填词,也让臣僚应制作词,而且建立大晟乐队,组织专职词人来填词作曲。词作公开进入朝廷庙堂,并设专门机构来创制词曲,表明词体作为独立的文学地位已经得到皇家君主的“钦定”认可。任何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词体被最高统治者接纳认同,也意味着词已经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尽管此后还有人对词体持藐视的态度,但已非主流。

第四,词的文体特性受到了强调。苏轼门人李之仪在《跋吴思道小词》中提出“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认为词应有不同于诗的独特风格。稍后的李清照《词论》指责苏轼词如“句读不葺之诗”而主张词应“别是一家”,强调词作应保持自身独立的文体特性。苏门词人晁补之、陈师道也从反面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晁补之《评本朝乐章》说黄庭坚的词“不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陈师道《后山诗话》批评苏轼“以诗为词”,“要非本色”。晁、陈主张作词要保持“本色”、

“当行”，与李之仪、李清照一样，也是要使词体具有独特性和独立性，以便词能够与诗分庭抗礼。如果词与诗没有实质的差别，词写得像诗，词也就失去了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而无法与诗抗衡。词“别是一家”说、“本色”“当行”论，都透露出一种共同的趋向：强调词体特性，重视词体价值。正因为词的地位、价值得到普遍的认同，词人队伍才日益壮大，“专业”词人才日渐增多，词作才日益贴近时代生活与现实人生，并逐步走向辉煌的顶峰。

第一章 文化背景

从文学史上看,那些扭转文坛局势、开一代崭新风气的大家,通常具备三大条件:第一,自身是举世公认的著名文学家,有多方面的文学才能和艺术修为;第二,有相当高的职位或社会地位;第三,善于品评人物,奖掖多士,拥有一批文坛盟友或追随者。

在客观方面,就北宋而言,在苏轼之前,欧阳修以文章名满天下,其史学、诗歌、散文、词学,皆有卓然成就,接着于嘉祐二年(1057)以翰林学士知礼部贡举,一举而得苏轼、苏辙、程颢、张载、朱光庭、曾巩、曾布等人,“天下翕然而师尊之”,有宋文体为之一变。进入元祐,欧阳修去世已经十余年,王安石、司马光也在这一年先后辞世,文坛上只有苏轼的位置最为崇高;元祐三年,苏轼又以翰林学士知礼部贡举,所以客观形势已经为他主盟文坛创造了条件。

在主观方面,苏轼此时实际亦以文章宗主自勉。李廌《济南先生师友谈记》尝云:“东坡尝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贵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苏轼这种明确的“盟主”意识,既是出于对欧阳修的尊重,以完成恩师所托为虑,更是出于对时代负责、对天下后世负责的高度责任感。他的这个地位,也是得到当时公认的。如曾经师事过道学家程颐的周行己《浮沚集》卷八的《寄鲁直学士》也说:“当今文伯眉阳苏,新词的砾垂明珠。”

元祐年间,苏轼利用其翰林学士知制诰及知礼部贡举的身份,大力推荐、扶持词学人物,壮大词学队伍,从而使苏门词人群体盛极一时,形成宋代词学的一大高峰。元年三月,苏轼得免试为中书舍人,九月,以试中书舍人为翰林学士、知制诰,立即荐黄庭坚自代,谓其“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举黄庭坚自代状》,《苏轼文集》卷二四)。又以贤良方正荐秦观。年底,召试学士院,拔黄庭坚、

张耒、晁补之等,诸人得授馆职。二年,荐布衣陈师道为亳州司户参军、充徐州州学教授,荐毛滂充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三年,知贡举,因误以他人考卷为李廌卷,而使之落第,大悔叹,赋诗自责,并谋与范祖禹同荐于朝,未果,然而李廌由是名益著。元祐六年自杭州还朝后,他又荐晁补之为著作佐郎,张耒为著作郎。于是形成了著名的“苏门四学士”和“苏门六君子”。元祐年间,他们聚拢在苏轼周围,彼此之间品评唱和,扬葩振藻,声气相求,桴鼓相应,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词学阵营,这对改变词坛风气、提高词的社会地位、扩大词的社会影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一节 元祐更化

在宋代词史上,元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北宋后期一些大家、名家,大都在元祐词坛有过活动,留下过不少作品。尤其是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廌、毛滂、李之仪、赵令畤等人,在元祐期间或者会聚于京师,或者相从于州郡,赓歌唱和,推求词艺,使词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一时风气也为之转变。元祐词坛遂成为南宋词人心中词学的“理想国”,他们谈艺论词时,“元祐诸公皆有乐府”(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七),“元祐诸公嬉弄乐府”(宋·汤衡:《张紫微雅词序》)之类的话语,更是不绝于口。

元祐时期词学兴盛局面的形成,应该有多种原因,但“元祐更化”实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元祐当权者多是老成持重的旧派人物,思想有些保守,但他们不扰民,不滋事,这样就给词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创作环境;他们又重用苏轼等一批文人,使之易于造成比较大的文学声势;“元祐更化”暂时结束了王安石之学一统天下的时代,强调学术自由和个人独创,有利于宋词多种风格的形成和发展;有鉴于新法实行时期士人投机钻营的不良风气,元祐时苏轼等人以“士节”相高,贬斥浮躁,促使词人们追求词的气格风骨,赢得了词风的真正转变。

一、元祐更化的起源

元祐(1086—1094),是宋哲宗年号,但历史上的元祐更化却始于神宗元丰八年(1085)。这年二月,神宗病重,宰相王珪乞建储君,并奏请皇太后权同听政,得到神宗首肯。三月,皇太后垂帘听政,立延安郡王傭为皇太子,赐名煦。同月,神宗驾崩,太子即位,是为哲宗。哲宗幼冲(时年十岁),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故政大多出自

其手。“太后(按:即高太后)既听政,即遣散修京城役夫,止造军器及禁廷工技,出近侍尤无状者,戒中外无苛敛,宽民间保户马”(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四三),从而拉开了元祐更化的序幕。同年五月,闲居洛阳十余年的司马光起知陈州,过阙被留为门下侍郎。当时天下百姓引颈拭目以观新政,而有些大臣却引孔子所谓孝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之言,大加申发,意在不改变现状。司马光以其资深元老身份出来维持局面,主张“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四三)。这几句话无异于正式宣布更化的开始。经过一系列的酝酿、讨论和争辩,“更化”方案逐渐出台:元丰八年七月,诏罢保甲法;十一月,罢方田均输法;十二月,罢市易法和保马法;元祐元年三月,罢免役,复差役;八月,诏复常平旧法,罢青苗钱。在九月司马光去世前,凡王安石、吕惠卿所建所行之法,基本上被更改过来。而这些措施,除免役、差役二法互有去取、略有变化外,始终奉行于整个元祐的九年之间,成为元祐施政的主要纲领。

王安石变法是历史的必然,它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广大人民的利益,缓和了封建国家的阶级矛盾,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王安石的阶级局限性,特别是由于他往往急功近利,加上具体执行人员素质不高,致使新法在执行的过程中,暴露出许多弊端,为反对派提供了攻击的机会。“元祐更化”反其道而行之,必以尽改新法为务,表现出相当的保守性;但在新法推行了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甚至在少数方面已经“民不堪其害”之时,“元祐更化”适逢其会,它所实行的措施恰恰弥补了新法的不足(至于其不善之处,却不被当时人所注意),因而赢得了百姓的拥护,使北宋王朝在其统治后期出现短暂的相对平稳时期,元祐之治也得到史家普遍的赞誉。《宋史·哲宗纪》“赞”曰:“哲宗以冲幼践祚,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马、吕诸贤,罢青苗,复常平,登俊良,辟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几仁宗。”明人也认为它可以“比隆嘉祐”(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四三)。

元祐,在宋代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时期。因为,在高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立即废弃元祐所为,历史进入了所谓的“绍述”时期,几乎所有方面都奉依元丰旧法行事;哲宗死,徽宗立,不但追复元丰旧法,而且还立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使元祐成了历史链条上的一条孤独之环。考察“元祐更化”与苏门词人群体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可以发现,前者之于后者,最重要的莫过于对苏门词人群体格局的影响。由于“元祐更化”偏于行政措施方面,因此随之而

来的必然是人员的任免。早在司马光去世之前,卫尉丞毕仲游就写信给他,建议说:“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其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数十,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九)司马光尽管未对此事予以足够的重视,但元丰旧臣的罢免还是很快就付诸行动了。元祐元年闰二月,王觴上疏,极论蔡确、章惇、韩缜、张璪朋邪害正,而孙觉、刘摯、王岩叟、朱光庭、上官均等也连章论蔡确罪,于是蔡确罢政,出知陈州,章惇同月罢;六月,吕惠卿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吕嘉问、邓绾、李定、蒲宗孟、范子渊等也被纷纷斥外。与此同时,吕公著、韩维、范纯仁、吕大防、文彦博等相继执政。苏轼曾经因反对新法被一贬再贬,黄庭坚坐与苏轼诗歌往来唱和,罚铜二十斤,由著作佐郎出知吉州太和县。这时,二人均得以起用。元丰八年六月,司马光等荐举苏轼、苏辙兄弟,谓其“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伏”(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七);九月,苏轼便以朝奉郎除礼部郎中,十月召还,十二月抵京师。同年四月,黄庭坚已奉诏为校书郎,九月到京。次年,张耒、晁补之相继入京,分别为试太学录、试太学正。至此苏门词人群体的格局即以诸人的入京而大定。

二、反对王学与力辟柳词

任何一个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演变,不仅与当时社会的文学艺术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有关,而且还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学术文化思潮密切相关。苏门词人群体在宋代元祐时期的崛起,就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特点,具体表现在反对王学与力辟柳词两个方面。

(一)反对王学

“元祐更化”以反王安石新法为归宿,元祐学术同样具有反王学特征。早在元祐元年四月,张耒以咸平县丞入京为太学录时,苏轼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就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按:指王安石)。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苏轼文集》卷四九)这里所说的“文字”包括甚广,诗、文乃至经义制策文都在其内。

北宋中期,曾经涌现出一股革新的社会思潮,作为对范仲淹所领导的政治改革